

中共、蘇聯關係的走向

尹慶耀

引言

共產黨人是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目標是在全世界建立一個沒有國界、沒有種族差別、也沒有階級對立的勞動公社，他們要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組織世界革命來達成此項目的。

共產黨人也是現實主義者，在上述共同理想未曾達到之前，他們都為自己的政權乃至自己的個人利害着想。

就理想主義言，共產黨人是一致的。就現實主義言，他們就可能有的分歧、摩擦、對立甚至是對抗。

從共產黨人的辯證邏輯觀點看來，世間事物都在依循正、反、合的辯證規律不停地「變」。變可能由內因或外因促成，更可能是現實主義的產物。舉例說，史達林的擴張慾一如希特勒，但他說，我和希特勒不同，因為我知道在那裏「止步」。此路不通就轉道而行，正是共產黨人的策略素養。他們不會死抱著理想睜眼跳火坑，也不會為了現實利害就放棄最終理想。他們的政策以及彼此關係，可能「變」也必然「變」，但除去另來一次非共產主義的革命，否則任何共黨政權，都不會「變」成自由世界的一份子。

本文將以上述觀點，分析北平和莫斯科關係的演變與發展，透視其基本走向。由於前此在「北平與莫斯科之間的新動向」（本刊第廿六卷第二期）一文中，已就經質、科技關係做了分析報導，本文將側重其他關係。又因為本文執筆時，適值中共和蘇聯邊界談判恢復前夕，對此一問題當作較詳敘述。

一九二九年爆發中東路事件，蘇聯進攻我東北。當時中共的口號是「武裝保衛蘇聯」，不少中共黨員，參加蘇聯遠東紅軍，對自己的祖國作戰。這被第三國際譽為「是共產國際和國際工人運動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①在這件事上，蘇聯是爲了向外伸張勢力，中共是爲了理想主義？還是爲了藉蘇聯之助奪取政權？這且不去管它。但它們都以中國政府（東北地方首當其衝）爲敵，倒是一致的。

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了政權，情況就應該有所不同了，就有些「變」了。據毛澤東說：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即史達林）受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揭掉蓋子，破除迷信，去掉壓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們就不贊成。他們不掛像，我們掛像。一九五〇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對於互助盟條約、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們的態度，一條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條是你堅持，我接受。這是因爲顧全社會主義利益。還有兩塊『殖民地』，即東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國的人住在那裏，現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後，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們的同志認識到，老祖宗也有缺點，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樣迷信。對蘇聯經驗，一切好的應接受，不好的應拒絕。現在我們已學會一些本領，對蘇聯有了一些了解，對自己也了解了。」^②

毛澤東的話證明，儘管同是馬列主義兄弟國家，蘇聯仍對中國懷有侵略野心。而中共獲取政權後，雖非一般民族主義者，但也不願把自己的東西平白送人，彼此就難免有些齟齬。

毛澤東說一九五〇年他在莫斯科和史達林吵了兩個多月是假的，事實是他在會晤過史達林一面之後，就從莫斯科失蹤，連中共「大使館」的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原來他被軟禁在莫斯科郊外一座別墅裏。互助同盟條約是周恩來談判成功的。合股公司或稱合營公司，那是蘇聯剝削其他共黨國家的「東印度公司」，中共答應在中國大陸成立大連造船、民用航空、新疆石油、稀有金屬（鈾）四個合營公司，或許正是換取互助同盟條約的條件，中共需要那個條約來穩固剛剛成立的政權。

拒絕合營公司，是狄托和史達林反目的主要原因。當時（一九四八年）中共政權尚未成立，西方希望毛澤東步上狄托的後塵。毛澤東說過：

「革命勝利後，（史達林）又懷疑中國是南斯拉夫，我（毛自指）就變成鐵托（即狄托）。……斯大林相信我們從什麼時候起呢？是從抗美援朝起，一九五〇年冬季，相信我們不是鐵托，不是南斯拉夫了。」^③

註① 「七年來的中國共產黨」（節錄共產國際執委會秘書處在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前夜所公佈的文集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前夜的共產國際），共產國際關於

中國革命問題的基本文件——從共產國際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會到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莫斯科，文學出版管理局，一九三五年版，一六—一七頁。

註②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中共某部輯印，一六三—一六四頁。

註③ 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四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四三—四四頁。

中共參加韓戰換得了史達林的信任，却使西方拉攏中共的希望落了空。

史毛互不信任，但史達林不死，恐怕毛澤東不敢背叛。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亡，黑魯曉夫在黨內權力鬭爭中想結「外援」以自重。一九五四年十月，他偕同布加寧、米高揚訪問中國大陸，十二日與中共簽署一連串文件，給予中共貸款及其他援助。修築蘭州——迪化——阿拉木圖鐵路，並組織直接聯運，也在其內。又決定合營公司的股權轉讓給中共，由中共逐年以物資抵償蘇聯應得的價款（東歐的合營公司，亦作如是處理）。

一九五六年起，毛黑之間因反史問題有了分歧，此後逐漸擴大而至對立。一九六四年十月黑魯曉夫垮臺，十一月，周恩來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慶典，順便試探改善雙方關係的可能性。當時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對周說，我們已把黑魯曉夫搞倒，下一次就輪到你們搞毛澤東了。周恩來見到布里茲涅夫時，布告以：「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上，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他們（布等）同黑魯曉夫沒有一絲一毫的差別。」④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死亡，蘇聯也想乘機改善同中共的關係。但它由蘇共中央發出的唁電，却被中共以雙方沒有黨的關係為由而被退回。

中共和蘇聯關係惡化原因衆多，但人的因素也不能完全忽視。鄧小平不像毛澤東那樣需要藉著反蘇來鎮壓內部反對者，問題就會比較單純些。

二

中共和蘇聯爭些什麼，問題也很複雜。

毛澤東反對蘇共對史達林鞭屍，和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即偶像化有關。他反對黑魯曉夫的「三和兩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政策，嘲笑過黑某「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即已公開斥責黑魯曉夫是伯因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和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3）的門徒，是修正主義者。對於六十年代後半蘇聯、東歐經濟改革，中共曾斥之為「利潤掛帥」、「資本主義復辟」。一九六八年捷克事件後，中共即斥責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

這些，都是有關馬列主義革命與建設的策略和方式之爭，西方稱之為意識形態之爭並不恰當，中共則稱之為原則性鬭爭。一九七一年春，中共發動「乒乓外交」。預定同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的美國生活雜誌，有史諾（Edgar Snow）的「同毛澤東的一次

註④ 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兩編輯部聯合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交談」，非直接引用毛的話，記述了一段談話內容：

「後來他們（蘇聯）派了一些古巴人，隨後又派了羅馬尼亞人去要求停止公開論戰。毛說，那不行。如果必要的話，要爭論一萬年。後來柯西金本人來了。他們會談後，毛對他說，他將減少一千年，但是不能再減了。」^⑤

這次談話的時間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却故意配合「乒乓外交」攻勢時發表。

毛死後，有一段華國鋒當政的短暫時期。除逮捕「四人幫」外，他仍然遵照毛澤東的政策行事。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譚震林對非律賓記者團談話，他說除非蘇聯首先認錯，並大量減少部署在中蘇邊界的軍隊，否則「中」蘇關係就不可能正常化。關於原則性鬭爭，他說至少需要一千年，甚至可能要一萬年。

一九七七年鄧小平再度復出，最初也想依照「三個世界」理論，推動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三個世界論」決定於毛澤東，由鄧小平於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在聯合國第六次特別大會中提出。其時中共以蘇聯為主要敵人，所謂反霸實即反蘇。一九七八年四月阿富汗政變，親蘇的塔拉基（Noor Mohammad Taraki）政權成立。六月，越南加入「經互會」（COMECON），正式成為蘇聯集團的一員。中共頗有三面受包圍之感，遂於同年八月十二日與日本簽署「和約」，十二月十六日與美國發表建交公報，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正式建交。這些舉措所換來的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蘇越間為期廿五年的「友好合作條約」；同月廿日為期二十年的「蘇衣友好合作條約」；十二月五日的蘇阿（富汗）「友好睦鄰合作條約」，以及廿五日越南以廿五萬大軍、數百輛坦克及若干架飛機，支援「柬埔寨救國民族統一戰線」（三日在河內宣布成立）對高棉發動旱季大攻勢。

對於「中」日「和約」，鄧小平於一九七八年十月親往東京換文，他在那裏大肆鼓吹「反霸條款」；對於「中」美建交，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廿九日，第一個訪問美國。同月三十一日，他與美國記者共進午餐時稱：談判或協定約束不了蘇聯的霸權主義，「需要的是，採取更加現實的、更加切實的可行的步驟，比如說，美國、中國（共）、日本、西歐和世界其他國家聯合起來，這些國家聯合起來對付蘇聯霸權主義。」又說：「我們叫越南人作東方的古巴，對付這樣的人，沒有必要的教訓，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會收到效果。」

據傳卡特總統對於鄧小平的「懲越」言論，並未表示支持或反對，鄧歸途中在東京再鼓吹「教訓」越南。二月七日金邊陷落，八日「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員會」成立，越南支持的韓桑林（Heng Samring）政權將中共支持的波布（Pol Pot）殘餘勢力驅逐至邊境地區。同日，越南與高棉新政權簽署為期五年的「友好條約」，初步實現其印支聯邦的計劃。二月十七日中共進兵越南，發動「懲越」戰爭。而中越共的衝突，事實上乃是中共和蘇聯鬭爭的一環。

註⑤ 陳雲翻譯，史浩，漫長的革命，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六月初版，一八七頁。

中共的「懲越」戰爭，不曾挑起美蘇衝突，日本則公開反對，蘇聯除稱讚英勇的越南人民有自衛的能力，是可以信賴的友邦外，更聲言蘇聯決心信守它和越南「友好條約」中的義務，同時警告中共要在爲時還不算太晚時退出越南。⑥

中共必然已經發現在先進國家間搞「國際統一戰線」，比在第三世界更經不起考驗。

同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通知蘇聯，俟一九八〇年四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後不再延長，同時建議與蘇聯舉行外長級以上的會議，以改善雙方關係，那是對蘇聯敞開談判之門，保持一條接觸的管道。

三

一九七九年雖有「懲越」、「廢約」等等事件，但隨著「關係正常化」談判的開始，雙方多管道接觸逐漸恢復，中共爲蘇聯摘掉修正主義帽子，「社會帝國主義」一詞也不知不覺地銷聲匿跡。起初，中共還將蘇聯的內政、外交公開，指其內部是社會主義，對外是擴張性的霸權主義。進入八十年代後，除在第三世界的場合外，連「霸權主義」一詞也少用了。

蘇聯方面對中共改善關係，表面上更爲積極，這表現在兩位領導人的兩次演說中。

一九八二年三月廿四日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塔什干演說，承認中共是社會主義；聲言反對「兩個中國」政策，認定中共對臺灣擁有主權；表示除不損及第三國外，願不附任何先決條件，與中共談判改善關係。

中共對這次演說所提改善關係，未再一口拒絕，表示願「聽其言，觀其行」。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策定「獨立自主」外交方針，聲言願與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和平共處」，又提出所謂「中」蘇關係三大障礙之說，都與其對蘇關係和策略有關。

一九八二年十月，雙方恢復因阿富汗事件中斷的副外長級關係正常化談判，只把名稱改爲「磋商」，現已舉行了十輪。官方接觸已達副總理後，經貿、科技、體育、文化等交流頻繁。

一九八六年七月廿八日，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在海參崴演說，重申蘇聯願在任何時候、任何級別上同中共認真地討論建立睦鄰局勢的補充措施問題。關於邊界問題，他強調蘇「中」是鄰邦，有世界最長的陸界，世世代代毗鄰而居。希望邊界不是將雙方分開，而是將彼此聯合在一起，成爲和平友好地帶。他同意與中共合建連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蘇聯哈薩克共和國的鐵路（即前述由迪化至阿拉木圖的鐵路，因關係惡化停築，現又恢復。）及雙方邊界河流得以主航道劃分。他表示蘇聯不願見邊界上的阿穆爾河（黑龍江）被當作「水上障礙物」，要讓這條大河的流域能聯合兩國人民的努力，利用其豐富的資源和水利建設謀取共同利益。

註⑥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第五面。

他說有關這方面的政府間協定正在共同仔細擬定中。他對中共現代化及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未來目標表示敬意。並建議與中共進行太空合作、協助中共訓練太空人員。關於中共所謂三大障礙，他提出要從外蒙分批撤出大部分軍隊，於一九八六年底以前自阿富汗撤出六團蘇軍，其中包括一個戰車團、兩個機械化步兵團及三個高砲團，其所配屬的武器、裝備等也隨同撤返蘇聯境內的原駐地（上兩項撤軍均已開始實現）。蘇聯認為中南半島問題涉及第三國，戈巴契夫演說中亦未提及。

中共反應仍相當謹慎，承認戈巴契夫演說中有「新」的、「積極」的東西，對某些部分表示重視歡迎，對於戈巴契夫避開柬埔寨問題不談表示不滿，對高層會議則仍予拒絕。

同年八月六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卡比察談話，聲稱中蘇邊界河流可以主航道劃界。十月初，蘇聯建議與中共合作開發黑龍江中若干島嶼。這些都是根據戈巴契夫海參崴演說所採取的步驟。

九月間，趁參加聯合國大會之便，吳學謙與蘇聯外長謝瓦納澤在紐約晤面，協議於一九八七年春恢復雙方邊界談判。這是一項副外長級談判，中共代表團長是副外長錢其琛，蘇方代表團長則由副外長伊里切夫換成羅加契夫。錢、羅也是關係正常化談判（磋商）的雙方代表團長，但邊界談判與關係正常化談判，是兩種不同的談判。

四

中共和蘇聯曾於一九六四年二月，在北平舉行過劃定邊界的初步談判。當時是以與一八六〇年北京條約有關的爭議地區，在條約上如何解釋、處理，以及河川航行、邊界標識等為主要議題。所謂爭議地區即是邊界未定的地區，從雙方提出的地圖上可以看得出來，因為蘇方所提地圖，邊界線都劃在邊界河流靠中國的岸邊。中共主張依邊界河流主航道劃界，它多次聲稱烏蘇里江、黑龍江邊界河流七百多個島嶼中，有總面積一千平方公里的六百多個島嶼，依中心線劃分應屬中國，但被俄國併入自己的領土。其中最大的是烏蘇里江與黑龍江合流處的黑瞎子島等，總面積三百平方公里。一九六四年的邊界談判無結果。

一九六九年三月初，中共同蘇聯在烏蘇里江中的珍寶島（俄稱達曼斯基）發生軍事衝突，很快就擴展至其他邊境地區。事後傳出，一九六九年春夏之間，蘇聯在中蘇邊界迅速增兵，製造小的衝突，並給北平最後通牒，限於八月十三日至遲是九月十三日開始和蘇聯協商邊界問題，且以進攻中國大陸摧毀其核子設施為要挾。同年夏，美曾秘密警告蘇聯，不得進攻中共，蘇聯多方考慮，可能受此影響而未動手。七月間在美蘇限武談判中，蘇提議如有第三國以核武器發動「挑釁性」攻擊，美蘇將以聯合行動對付之，為美國拒絕。①又稱，一九六九年時，尼克森政府曾接獲蘇聯文件，要求美國對蘇聯進攻中共一事表明立場，華盛頓方面

註①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辛頓教授在美國眾議院亞太事務委員會講詞。

曾堅決反對蘇聯採取是項行動。華盛頓方面認為，由於「中」蘇戰爭具有破壞安定、又難於預測的結果，而不讓蘇聯享有攻擊中國大陸的戰術先機，基於美國利益，乃將是項消息透露給中共。一九七四年四、六、八月，中共三獲警告，衆信係來自美國。⑥

這些傳說是否屬實，姑置不論，但一九六九年就中共而言，確屬危機嚴重。爲此，它才一方面與蘇聯開始談判，一方面圖謀與美國接近，以便抓住一根救命草。同年九月，柯錫金赴河內參加胡志明葬禮，十一日於歸途中從塔什干轉往北平，與周恩來在機場會談，也就是毛澤東所謂「後來柯錫金本人來了」那一次。雙方會談結果，協議自同年十月二十日起，在北平舉行副外長級邊界談判。

談判開始之前，中共公開提出若干主張，其要點爲：（一）中共不要求歸還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割佔的中國領土（一五〇萬平方公里），但蘇方必須承認該等條約爲不平等條約，將來要另訂新約、勘界立標；（二）違約多佔對方的領土原則上必須歸還給對方，但可根據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原則，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作必要的調整；（三）邊界問題未解決前，雙方武裝力量從爭議地區（三萬三千五百平方公里）撤退或不進入，脫離接觸。蘇聯則以雙方邊界業經爲歷史所固定爲由，否認有邊界問題存在。

一九六九年開始的馬拉松式邊界談判，於一九七八年五月以後中斷，未聞有何重大進展。但經停頓九年之後，又於一九八七年二月九日恢復，這件事本身就值得重視。這次談判是在莫斯科，錢其琛已於八日率團抵步，預定談判爲時兩週。本文完稿時談判剛剛開始，而且談判內容和關係正常化談判一樣，約定對外秘密，我們也不易獲知。惟從各種跡象看來，這次談判要達成若干協議，比較前此的談判就容易得多，其理由如左：

首先，雙方已沒有了劍拔弩張的對峙形勢，毋寧說是在比較友好的氣氛下進行談判。其次是雙方再沒有什麼修正主義、教條主義之爭，雙方領導人已不必藉對外緊張來緩和內在矛盾。相反的，雙方都有內部經濟改革問題，都強調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而且胡耀邦和戈巴契夫都曾公開表示重視長達七、五〇〇餘公里的中蘇邊界的和平。復次，由雙方邊界貿易的迅速增加，邊界鐵路的重修，邊界大陸橋樑的興建等等跡象看來，雙方敵意確已減少，合作、交流的意願增高。最後，蘇聯在邊境劃界、三大障礙等問題上，即是有有限度的，然確以「讓步」的姿態向中共立場接近。以上種種，均可使談判較前容易。

依河流主航道中線劃界，乃國際慣例，蘇聯此項讓步，應屬理所當然。然此舉將使珍寶島、黑龍江中之八岔島、黑瞎子島等若干島嶼，均在中國版圖中。自可減少爭論，使談判趨於簡單。這當然不是說談判會一帆風順、暢行無阻，原則接近並不等於實際問題的解決。例如，雨季和旱季邊界河流的主航道不同，談判時仍可存有爭議存在。何況中共和蘇聯，當前對外策略有異，影響到雙方關係，未必能一拍即合。

簡略地說，蘇聯對中共是採取政經合一政策，而中共對蘇聯乃至對西方都寧願採政經分離。不論布里茲涅夫或戈巴契夫，他們與中共接近都含有重新團結共黨集團和分化中共與西方關係的動機，而這些正是中共要竭力防止的。中共在理論、邏輯上不反對共黨集團重新團結，但它要保持「獨立自主」的地位，不願再聽由蘇共或蘇聯發號施令。和蘇聯增進經技合作或在邊界問題上獲得蘇聯讓步，對中共有利，但中共不願因與蘇聯接近，而損及它同西方的關係。當然，中共對西方也只接受其資金、技術而拒絕其思想意識，那就是當前中共一方面對外開放，一方面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由來。

蘇聯有意宣揚它同中共關係的進展，中共就設法予以沖淡。中共拒不接受蘇聯所提舉行高階層會議的建議，不恢復黨與黨的關係，只承認同蘇聯經貿等實質關係有進展，却強調政治關係無改善。然而，中共這項策略的立場，究竟能夠維持多久，却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

五

最新一期的情報文摘說，雷根總統與蘇聯領袖戈巴契夫均曾提出太平洋時代或太平洋世紀的觀念。這份雜誌指出，由於濱臨太平洋的各國經濟力量日趨強大，世界列強競相爭取在亞洲及太平洋的影響力。^⑨

這種說法是非常正確的，美蘇都在為進入太平洋世紀而努力。

就蘇聯來說，前述布里茲涅夫和戈巴契夫的兩次演說，地點都在遠東，但後者更明顯地面向整個亞太地區，同中共的關係，只不過是其中重點之一。

如果我們說戈巴契夫時代的蘇聯，其對外政策與全球戰略，都把重心東移至亞太地區，應該不會有太大錯誤。戈巴契夫曾在演說中聲言：「我們大部分疆土是在烏拉爾山以東，也就是在亞洲。」他又宣稱，蘇聯願在發生於太平洋邊緣的「世界復興史」中擔任一個主要的政治與經濟角色。這明白顯示蘇聯決意在太平洋世紀成為亞太地區的超級強國。

蘇聯的經濟開發重心也漸向東移，其在東部的軍力與戰力正不斷加強。戈巴契夫於檢閱了蘇聯遠東軍隊之後，在海參崴發表演說，就表示他的亞太政策有武力支持，也象徵了蘇聯全球戰略的重心東移。

戈巴契夫倡言以一九七五年在赫爾辛基舉行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為藍本，召開一次太平洋國家會議，以確立「國際安全保障體系」。他建議這項會議在第一個原子彈轟炸的犧牲者——日本的廣島召開，又公開表明要簽署南太平洋非核區域條約。轟炸廣島的是美國，對南太平洋非核區域條約，美國也拒絕參加。戈巴契夫要爭取某些方面的同情、共鳴，使蘇聯處於宣傳優勢

註⑨ 轉自臺北：中央日報，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三日，第一版。

，那對它進出亞太地區是頗為有益的。

蘇聯外交部已將過去的第一遠東司、第二遠東司撤廢，新設亞洲社會主義國家局，主管中共、北韓、外蒙、越南、高棉、寮國事務；成立東協司，主管東協六國事務；新設太平洋司，主管日本、澳洲、紐西蘭及若干太平洋島嶼國家事務。這不是偶然性的改組，而是蘇聯進入太平洋世紀的一項準備。

戈巴契夫又常重提「亞洲集體安全體系」，這和一九六九年六月布里茲涅夫初提此「體系」時，已具有不同的意義。當年布里茲涅夫擬藉此「體系」包圍中共。如今戈巴契夫要重新團結亞洲共黨，作為此一「體系」的支柱，中共應扮演一個重要角色，而不再是被包圍的對象。

蘇聯外交部成立「亞洲社會主義國家局」，自然是為了重新團結亞洲共黨。據傳戈巴契夫擬召開亞洲共黨會議，地點選在外蒙的烏蘭巴托（庫倫），為此它促使外蒙於去（一九八六）年與中共簽署領事條約，又示意外蒙於今（一九八七）年與美國建交，以提升這個共黨政權的國際地位。

蘇聯要團結亞洲共黨國家、召開亞洲共黨會議，促成「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乃至亞太戰略的實施，不將中共由阻力變成助力，就一切談不上，難道蘇聯會懵然不知！因而最近蘇聯不惜以經濟籠絡、政治讓步，要設法將中共拉回自己陣營。問題是中共却不如此積極。

中共對蘇聯仍有猜忌，更不願因與莫斯科接近而失去從西方獲取實利的機會。中共盡力避免與蘇共恢復黨與黨的關係，但它同東歐國家的黨政關係卻不斷增進。去年，波共邀請胡耀邦和李先念往訪，東德共黨領袖何內克應胡、李之邀訪向中國大陸，黨政頭銜都會出現。東歐各國領袖紛紛訪問中共，行程大都是先訪平壤，再到北平，歸途經烏蘭巴托，再至莫斯科向克里姆林宮報告，他們顯明地都是奉命行事。中共不反對先經東歐作些迂迴，但與蘇聯恢復黨與黨的關係將延後辦理，因為那對中共當前有損無益。不過，雙方執政者乃至一般官員都是共產黨員，不恢復黨的關係並不妨害增進彼此的實質關係。從長遠觀點看，這種關係也不會永不恢復。在短期內，中共可將三大障礙重心放在中南半島，用作對蘇關係的制動器，以防此項關係過熱，會引起西方的疑忌。

反觀西方，美國也在增強其西太平洋區域的兵力，其西太平洋戰略支柱似已移至日本與韓國，並援助亞洲自由國家，增強其自衛能力。但對於中共，仍然不脫以共制共的想法。美國與中共有限度的軍事合作正在進行。去年五月，美國國會通過對中共出售五億五千萬美元的導航及射控雷達系統。三艘美國軍艦訪問過青島，對共產國家輸出管制委員會（COCOM）禁運的物資，對中共解禁了近百分之七十五。反坦克武器、砲兵裝備、防空武器及水面與反潛作戰裝備等較高層次科技的轉移正在增加，美國為中共代訓軍事人員，並與中共從事軍事情報的交換與合作。其他西方國家也以軍用物資售與中共，並轉移與軍事有關的部分技能。

西方似乎仍然存有一項老觀念，以為中共牽制了蘇聯四分之一的總兵力，可減少蘇聯對西方的威脅。此一觀念第一是小看了

蘇聯的志量，以爲它增兵遠東是爲了對付中共，而忽視了它的更大企圖。第二協助中共增強兵力以對抗蘇聯，與前述一九六九年美國爲免破壞安定而阻止蘇聯進攻中共，委實有些矛盾。第三是只注意到自己的意願，而忽視了中共本身的想法。一九七三年八月，周恩來在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中說：「西方總想推動蘇修向東，把這股禍水引向中國，西方無戰事就好。……現在，蘇修是聲東擊西。」在中共和蘇聯尖銳對抗時，中共也不願接受西方把「禍水引向中國」的策略，而要把那股禍水推回西方。正值北平和莫斯科關係改善的現在，中共豈肯甘作西方的馬前卒？西方國家不願將自己的國土，作爲抗蘇的戰場，中共又何必站在反蘇的第一線，去爲西方火中取栗？

日本與美國有貿易摩擦，對美國強求其軍費突破其國民總生產毛額（GNP）百分之一的上限也有所不滿，但它仍然參加美國的「星戰計劃」而不曾倒向蘇聯，因爲日本是自由國家。誠如美國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芮孝儉所說，美國和中共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社會、文化和政治上的差異。④儘管去年底，中共「外長」吳學謙表示「『中』美關係基本平穩應繼續有所發展」，「貿易關係保持了良好的勢頭，兩國在科技合作、教育文化交流、兩軍交往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發展。」但我們絕不相信中共會成爲自由世界的一員，因爲它是共黨國家。

中共和蘇聯的雙邊貿易（除去邊界貿易）去年爲二六億美元，而中共和美國的貿易，去年可能接近一〇〇億美元。⑤但中共和蘇聯經貿關係增長的速度驚人。在星戰計劃、中東乃至中南美等問題方面，中共和蘇聯的立場出奇的一致，而與美國則針鋒相對。此等事實，應該是西方對中共關係中的一項啓示。

截至現在爲止，中共左右逢源、多方獲利的對外政策有其成功處，但這只是短程的策略運用，並非其最終鵠的。在蘇聯亞洲戰略着着實施的過程中，勢將逐漸迫使中共表態、攤牌。中共也將面臨着若干二者擇一的決定，它將重返共黨陣營抑或長期孤立。在共黨集團之外？再者，目前的多元世界，實際仍是自由與共產兩大陣營的對抗，一旦面臨攤牌階段，中共究竟站在那一邊？

中共和蘇聯目前仍有矛盾、爭執，但已不像過去那樣勢不兩立。面對着太平洋世紀即將來臨，蘇聯要成爲亞太地區的超級大國，中共也想藉外力（包括東西雙方）之助，增強國力以提高其在國際間特別是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中共和蘇聯關係的基本走向，就不會是互相抵銷的對抗，而將是逐漸和解決而合作，這在中共內部保守勢力抬頭的情況下，更比前此容易些。因此，西方國家的遠東政策，也將面臨着若干二者擇一的決定，是長遠利益服從目前利益？還是目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是援助一個共黨政權、在不穩定的情況下希望它去牽制蘇聯？還是團結和援助亞洲自由國家，使其強大、堅定，構成亞太地區遏阻共黨勢力的防波堤？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四日脫稿（本文作者現爲本中心特約研究員）

註④ 中國時報（臺北），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三日，第一版。
註⑤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二版。